

Ruth Wodak 话语-历史分析法中的 哲学社会学思想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 杨 敏 王 敏

提要:批评话语分析学家 Ruth Wodak 创建的话语-历史分析法(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根源于深厚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DHA 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福柯的后结构和后现代理论、维特根斯坦后期理论,以及布迪厄、吉登斯和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笔者期望通过对 Ruth Wodak 的 DHA 方法的哲学和社会学理念的系统梳理,深刻理解批评话语分析的具体哲学和社会学根基,为其交叉学科的阐释模式和发展做系统的理论探讨。

关键词:话语-历史分析法、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福柯话语理论、社会学思想、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 (2019) 03-0347-10

1. 引言

Ruth Wodak 作为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自成体系,迄今已发表论文 300 多篇,专著、合著和编著近百部,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Wodak (2009: xii) 认为,话语分析学者的责任是用不断创新的交叉学科的理论 and 解析形式来深刻地剖析后现代人类经验,揭示现实与历史的真实。在研究中,她从哲学的角度解构、批评并重构现实社会和政治,运用语言符号系统把现实与历史重新语境化,用不断创新的话语分析形式来表现她对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给人们提供应对和改变现实的新思想、新方法,启发和鼓舞人们根据新时代语境构建新的身份认同(Wodak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Ruth Wodak 政治语篇分析的学术思想研究”(15BYY177)的阶段成果。

& Meyer 2009: 17)。她的哲学观、社会观和话语观以及贯穿始终的人道主义正义感,在语言学界非常罕见、难能可贵。但是,国内语言学界对其多是一般性介绍,缺乏纵深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重点分析 Wodak 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想渊源。

为了追踪分析 1986 年奥地利总统选举运动时的典型反犹话语 (Wodak & Meyer 2009: 18; Reisigl & Wodak 2016: 31), Wodak 创建了话语 - 历史分析法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之后一直改进 DHA 用以分析“反犹话语”、排外话语、种族歧视话语等。与其他 CDA 的研究范式不同, DHA 在对话语阐释的过程中把历史看作一种话语结构,把语篇事件所嵌入的社会和政治场域背景以及历史资源整合,从主题、话语策略和语言形式三维视角观察潜在权力动态和范围 (Wodak 2009: 38; Reisigl & Wodak 2016: 31)。本文通过梳理 DHA 相关的各种论著,从哲学和社会学的不同角度探讨该理论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

2.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思想

Wodak 在著述中多次提到, CDA 各流派的理论渊源与研究方法各异,但均强调“批评性”,此术语可以追溯至法兰克福学派 (the Frankfurt School) 和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Fairclough & Wodak 1997: 261; Wodak 2001a: 2; Wodak & Meyer 2009: 6, 2016: 6)。

法兰克福学派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该学派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 (霍克海默 1931, 参见王凤才 2011)。该批评致力于进步性的社会变革,具有解放性的社会功能 (Wodak & Meyer 2016: 6-7)。作为 CDA 的经典方法之一, DHA 一直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性”哲学视为研究基础,为语言学参与社会建构和社会改革提供鲜明的现代主义理论支持 (Forchtner 2011)。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批判理论应当结合所有主要的社会科学 (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政治科学、人类学和心理学) 来提升对社会的理解。因而, DHA 强调: 为了更好更恰当地理解语言在组成和传递知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组织社会机构和行使权力时的功能,有必要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 (Wodak & Meyer 2016: 6-7)。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语言哲学为 DHA 的三维批评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 (Forchtner 2010, 2011)。DHA 批评概念的第一维度是文本 / 话语内部的批评 (Reisigl &

Wodak 2001: 32)。这个维度的批评独立于研究者的观点,用到了哈贝马斯总结的进行文本内部批判的元素。例如,上下文不一致和忽略他人的论点可能预示着个人或社会性的交际障碍。DHA 批评概念的第二维度是运用话语策略进行社会诊断批评,旨在揭秘例如右翼民粹主义等话语(同上)。哈贝马斯的论证基于四种“有效性要求”的概念为 DHA 第二维度的论辩话语策略批评提供了理据性:真实性要求、正确性要求、真诚性要求和可理解性要求(Wodak 1996: 29; Reisigl & Wodak 2016: 61)。DHA 理论把哈贝马斯的有效性要求概念与“谬论”(fallacies)概念相结合,探讨语篇的论式(topos,即整套用作论证基础的一般化思想),包括情感论式、权威论式、定义论式等,以分析沟行动主体的表达模式中潜在的谬误论证,从而发现社会政治话语中的谬误即歧视性话语、偏见话语、谎言话语,以此达到批评社会、改造社会的意图(Reisigl & Wodak 2009: 100; Wodak 2009: 44; Wodak *et al.* 2009: 36; Reisigl & Wodak 2016: 35)。DHA 批评概念的第三维度涉及历史话语和语境,对社会进行“前瞻性批评”和“回顾性批评”,目的在于改变现状(Reisigl & Wodak 2001: 33-34)。此维度提及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概念,协商民主依赖包容平等的沟通(同上: 263-271)。在协商民主的背景下,牢记历史的回顾性批评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协商性的社区;同时,根据话语的现状和发展可以对社会进行前瞻性批判。DHA 强调三维度批评概念的批判话语观,与哈贝马斯的文本内部批判、论证有效性要求以及社会互动历史背景的观点(Fairclough & Wodak 1997: 261)等相契合。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语言哲学对 DHA 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

3. 福柯的话语理论

CDA 的理论教父之一,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思想对话语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Weiss & Wodak 2003: 6; Wodak & Weiss 2005: 124)。一些学者倾向于把福柯对话语的研究分为前期关注话语(定义)的考古学阶段和后期解构话语、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的谱系学阶段。DHA 也分别受到这两个阶段的不同影响。

DHA 赞同福柯把话语定义为话语事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个观点(Wodak 2008: 5)。Wodak (1996: 13)将话语进一步定义为在某种领域(例如医疗话语)中互动关系的总和,认为可以对话语进行细致的功能剖析,在话语事件之间辨别静态和动态关系,阐述历史变化的原因和结果(Wodak 2008: 5)。

Wodak (1996)的专著《话语的无序》暗示了与福柯的《话语的秩序》(Foucault 1984)的相关性。与福柯认为的更抽象意义上的话语的秩序相反,Wodak 在书中研究实证性话语,认为即使明显的话语无序最终也会系统性地与

社会结构相关,即在无序中也存在秩序,这是对福柯的话语秩序的补充(Wodak 1996: 8, 15)。Wodak 曾在多篇文献(参见 Wodak 1996: 24; Heer & Wodak 2008: 10; Wodak 2008: 5)中引用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的一些关于话语事件的本质和背景的核心公理:在每个社会,话语的生成同时受一定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影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物质性。也就是说,话语从生成开始就是不自由的,社会对于话语的生成具有一种恐惧心理,总是需要一些程序来对其进行驯化,以达到一种稳定性的功能,避免出现话语的无序。Wodak (1996)对医患关系话语的实证分析丰富了福柯对话语研究的后结构主义理解。

话语谱系学概念涉及话语的变化和解构话语、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福柯认为,话语的变化只存在于表面形式,对于解构权力无作用,主体积极干预的可能性也被否定。但是,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权力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权力根据具体的战略、目标或利益再现(和塑造)知识。在此基础上,Wodak (2009: 46)提出了话语、知识、权力三者关系的假设:话语能够行使权力,是因为它们传递了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所赖以生存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个人和集体、话语和非话语行动的基础,而这些行动反过来又塑造了现实。受福柯影响,Wodak (同上: xiv)认为政治本质上就是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与(话语和社会)实践和包容或排斥策略有关。在研究“政治如常”(politics as usual)时,Wodak (同上: 45)运用 DHA 识别政治组织话语中包含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如何与欧洲议会等政治组织中的“权力/知识”复合体中的权力关系联系起来,以此来探究“权力/知识”形成社会统治的特殊机制。

Wodak (同上: 48)阐释福柯的观点并认为“(组织的)权力就是知识”,在一个社会群体中,“规范化”的知识并不一定赋予另一个社会群体“规范化”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大型(政治)组织是由机构赋予的合法知识与其抵抗的知识构成的复杂多样体。这意味着任何机构(因此也是政治)环境中的权力都是异质分布的。知识体现在物质和话语实践中以及依赖于特定背景的议程、需要、利益和战略意图的知识形式中。例如,在欧盟议员参与的物质、社会和话语实践中,权力/知识的形式与话语、体裁以及话语的类型存在辩证关系。因此,DHA 才能够记录欧盟政治日常的权力斗争,在斗争中,竞争的声音和利益与知识的谈判、构建、实施和沉淀相结合。

由此,可以发现 Wodak 受福柯前期对话语后结构主义研究的影响,形成了其对话语的定义;基于福柯对话语变化的后现代谱系学见解,发展了话语变化在变革社会结构中的解放作用;并以福柯关于“权力/知识”共生体的认识为理论支撑,解释了机构中的权力运转机理。

4. 布迪厄等人的社会学思想

DHA 认为话语与社会存在辩证关系,且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间接的,经由媒介构建。在对于此媒介认知的过程中,DHA 得以吸收社会学概念,例如布迪厄、吉登斯和伯恩斯坦等社会学家的思想。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理论主要基于“习性”、“社会场域”和“资本”三个概念及其三者之间的联系。布迪厄把结构主义框架与社会语境中的主体性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通过实践联系起来的习性和场域可以衔接社会研究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习性被定义为人们的身体和心灵中存在的文化结构和意义,场域是世界上的一系列关系。通过实践,场域限制习性,习性影响场域。实践在场域的内部与外部之间进行调解(Wodak 2009: 11-12)。

“国家身份”概念是 Wodak 对布迪厄习性概念的发展。“国家身份”意味着相似的概念和感性图式,相似的情感倾向和态度,以及相似的行为习俗,被其拥护者集体分享并通过社会化(教育、政治、媒体、体育或日常实践)得以内化(Wodak et al. 2009: 4)。Wodak 认为,在区分“国家身份”和“国家性格”的概念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混淆:这两个术语有时被用作同义词,即使是布迪厄本人也是如此。Wodak 澄清了这个问题:与“国家身份”不同,“国家性格”只是一个刻板的幻象,在信仰者的头脑之外没有真实的对应物。Wodak 将具有欺骗性的刻板形象只分配给习性概念的三个层面(心理、情感和态度、行为定势)中的前两个。但是,Wodak 赞成布迪厄关于身份概念的其他观点,例如政权通过学校和教育系统,塑造了感知、分类、解释和记忆的形式,这些形式是习性的基础,而习性构成“国民常识”的基础(同上:29)。Wodak 对“国家身份”概念的阐释使得“种族歧视话语”、“排外话语”等分析有了鲜明的理论依据。

以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为出发点,DHA 将话语视为“特定社会行动场域中依赖于语境的符号学实践”(Reisigl & Wodak 2001: 36)。不同的行动场域被话语实践的不同功能所定义,例如政治场域分为八个不同的行动领域,某个特定主题的“话语”可以在一个行动领域中找到它的出发点,通过体裁进行体现。随着话语“传播”到不同的场域,与其他话语相关或重叠,形成新的主题。Wodak (2008: 16-17)详细分析了政治场域中行动场域(fields of action)、体裁(genre)和话语主题(discourse topic)之间的关系。

资本概念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布迪厄将经济资本(例如:金钱)、社会资本(例如:人际关系)和文化资本(例如:教育)区分开来。这些形式的资本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象征性资本(symbolic capital),它是最强

大的资本形式:“不同主体行动者的重要性取决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这意味着他们是否从群体中获得认可与制度化……”(Wodak & Vetter 1999: 212)。布迪厄提出用象征性资本代替语言能力,因为言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语言能力。布迪厄将语言视为一种权力机制,并发明了“象征性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这个术语,指操纵象征性资本来控制民众。Wodak 赞同布迪厄关于政治场域充满象征性暴力的观点(Wodak & Forchtner 2018: 4),并且认为布迪厄的象征性资本理论在欧洲是社会语言学从社会学借用的最重要的两个理论之一(Wodak 1996: 5)。

总而言之,将布迪厄的结构主义社会理论纳入 DHA,使得对话篇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获得社会学的视角,为 DHA 带来了方法论的启发和进步(Forchtner & Schneickert 2016)。

DHA 在社会理论的形成中还受到以结构化理论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影响。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为体存在辩证关系,社会结构是人们的行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一方面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人们在日常活动中也能积极地作用于和反作用于社会结构(Wodak & Ludwig 1999: 14; Delanty *et al.* 2011: 5; Wodak & Meyer 2016: 17)。吉登斯关于“组织机构随着时间发展并变化”(Wodak 1996: 11)的动态描述使得 Wodak 坚持话语分析的历时与共时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布迪厄和吉登斯的社会理论构成了 DHA 的“宏观理论”(grand theories),此理论是抽象的理论,用来阐述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辩证关系,是 DHA 兼收并蓄的理论基石。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关注的是特定的社会现象,例如冲突、认知、社会网络,或社会特定的子系统,包括经济、政治和宗教(Wodak & Meyer 2016: 17)。宏观理论是基础,在具体分析中,中层理论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分析目的(Wodak 2001b: 70),中层理论的概念性工具包括来源于认知科学的计划、框架、图式、脚本等(纪卫宁 2013)。

Wodak 认为话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语境重构概念(recontextualization),此术语是英国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首先提出来的(Wodak & Ludwig 1999: 13)。伯恩斯坦认为语境重构作为一个过程,不仅包含某些话语部分/方面(论点、思想、概念)的“运动”,而且是建立某种话语层次结构的战略过程(同上)。这影响到 Wodak 对语境重构概念和话语实践转变的理解。Van Leeuwen & Wodak (1999)区别了涉及语境重构的四个典型转变形式:元素的重新安排(例如,重新安排活动的顺序)、删除元素、增加目的或理由等要素、元素的替代。Wodak 在分析特定话语实践例如国家身份话语、政

治话语和过去建构话语中,多次用到语境重构概念的逻辑(Heer & Wodak 2008: 12; Wodak *et al.* 2009: 3; Wodak 2015: 90)。

综上所述,DHA 在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布迪厄、吉登斯和伯恩斯坦等社会学家的各种结构主义社会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理解和分析话语的方法论。

5.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可以大致理解为:语言是生活方式中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语言游戏。Wodak(1996: 14)深受语言游戏观里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和“意义用法论”等概念的影响,从中获得了理论依据。

“语言游戏”的概念并非是把语言看作一种静态固定的东西而将之与“游戏”简单相加,而是着眼于人们使用语言的动态活动,强调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考察语言的意义。这与将语言视为孤立静止的描述符号的传统观点是格格不入的(涂纪亮 2005: 27)。受此影响,Wodak(1996: 16, 1999)认为语言不是孤立的现象;语言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与社会过程互动以及相互交织;言语就像游戏一样遵循特定的规则。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中的“生活形式”概念是指语言的述说是一种行为,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因此,Wodak(1996: 16)认为言语不是纯粹的知识、认知过程,而是作为行为的一部分,即“生活形式”;话语社会语言分析法就是要探究社会文化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还认为,词语意义必须依赖具体的语境才能被确定,主张将词语意义等同于词语的用法,这就是他的“意义用法论”(王寅 2013: 7)。这一观点自然就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Wodak 的语境思想包括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知识,这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和“意义用法论”的概念都有关:只有我们考虑特定情况下的使用,理解基本的惯例和规则,认识到嵌入的某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并且最重要的是,知道话语与过去的关系,话语才有意义;话语总是与之前产生的其他话语以及同步和随后产生的话语联系在一起(互文性)(Wodak 1996: 19; Fairclough & Wodak 1997: 276)。

故而,作为 DHA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包含历史在内的语境受到 Wodak 的关注和强调,历史为其一切话语分析的内在逻辑提供支持。这在 Wodak 分析二战大屠杀相关话语、战后反犹话语、目前欧洲的排外话语等时,尤其显示了重要性。

6. 与 Fairclough 和 van Dijk 学术思想的对比

Wodak 等 CDA 的主要学者都深受 20 世纪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一些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但是,不同的学者运用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Norman Fairclough 比较鲜明的特点是,早期接受了福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和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的思想,进行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研究,注重话语中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解构 (Fairclough 1989, 1992, 2003)。近年来, Fairclough 的批评话语分析思路着重以英国哲学家奥斯汀 (John Austin) 的言语行为理论和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 (John Searle) 的言外行为条件理论为基础,把论辩 (argumentation) 当作一个复杂的言语行为,看成社会的和理性的活动,讨论论辩策略在政治话语中的作用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这反映出 Fairclough 从被动关注话语内部的权力关系到主动以言行事的思想改变。另一位 CDA 重要人物 van Dijk 的主要特点是运用社会学和认知科学结合的“话语 - 认知 - 社会三角”模式来呈现和界定意识形态,通过话语、认知和社会的三者互动,消除权力话语的神秘性 (van Dijk 2009)。

相比之下, Wodak 受哈贝马斯影响较大,强调批评话语分析是对社会的改良实践。她的 DHA 方法凸显了人文主义政治观和社会历史语境观,主要针对“反犹话语”、“种族歧视”、“排外”等政治话语进行分析,尤其强调话语的历史语境。当下话语经由语境重构,回溯到历史语境,才能揭示潜藏的权力关系。

7. 结语

本文从哲学和社会学的不同角度探讨了 Wodak 的 DHA 理论中所蕴含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想。DHA 把抽象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与具体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解释话语与社会如何在历史语境及其重构中实现互动,以及社会实践如何体现在话语的微观层面。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Wodak 是一位具有后结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人道主义政治观和社会历史语境观的话语分析学者。她用不断创新的交叉学科理论来表现后现代人类经验,严肃关注现实,深刻反思历史,以思想家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超越了语言学的只重形式、放逐意义的局限性。Wodak 为新世纪国际政治语篇分析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她的哲学社会学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对于促进语言学的人文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研究期望通过对 Wodak 的哲学社会学理念的探索,最大限度地理解 DHA 批评社会、改造社会的模式,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提供学科间的对话与

合作的哲学基础。目前,我们正面对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变化。话语与所有这些变化密切相关,相信同时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 DHA 这一用以发掘并且改造社会问题、追求公平正义的话语分析理论与策略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 Delanty, G., R. Wodak & P. Jones (eds.). 2011. *Identity, Belonging and Migration* [C].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I. & N. Fairclough. 2012.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Oxon: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2003.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 Analysis for Social Change* [M]. London: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 R. Wodak.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C]. London: Sage. 258-284.
- Forchtner, B. 2010. Jürgen Habermas' language-philosophy and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J]. *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4: 18-37.
- Forchtner, B. 2011. Critique,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8: 1-14.
- Forchtner, B. & C. Schneickert. 2016. Collective learning in social fields: Bourdieu, Haberma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J]. *Discourse & Society* 27: 293-307.
- Foucault, M. 1984. The order of discourse [A]. In M. Shapiro (ed.). *Language and Politics* [C]. Oxford: Blackwell. 108-138.
- Heer, H. & R. Wodak. 2008. Introduction: Collective memory, national narra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A]. In H. Heer, W. Manoschek, A. Pollak & R. Wodak (eds.).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Remembering the Wehrmacht's War of Annihilation* [C]. London: Palgrave. 1-13.
- Reisigl, M. & R. Wodak.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M]. London: Routledge.
- Reisigl, M. & R. Wodak.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ition) [C]. London: Sage. 87-121.
- Reisigl, M. & R. Wodak. 2016.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3rd edition) [C]. London: Sage. 23-61.
- van Dijk, T. 2009.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M]. Cambridge: CUP.
- van Leeuwen, T. & R. Wodak. 1999. Legitimizing immigration control: A 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 [J]. *Discourse Studies* 1: 83-118.
- Weiss, G. & R. Wodak. 2003. Introduction: Theory,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G. Weiss & R. Wodak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C]. London: Palgrave. 1-32.
- Wodak, R. 1996. *Disorders of Discourse* [M]. London: Longman.

- Wodak, R. 199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J]. *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 32: 185-193.
- Wodak, R. 2001a. What CDA is about: 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1st edition) [C]. London: Sage. 1-13.
- Wodak, R. 2001b.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1st edition) [C]. London: Sage. 63-94.
- Wodak, R. 2008. Introduction: Discourse studies – Important concepts and terms [A]. In R. Wodak & M. Krzyzanowski (eds.). *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 London: Palgrave. 1-29.
- Wodak, R. 2009.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Action: Politics as Unusual* [M]. London: Palgrave.
- Wodak, R. 2015. *The Politics of Fear: What Right-wing Populist Discourses Mean* [M]. London: Sage.
- Wodak, R. & B. Forchtner. 2018. Introducing the language-politics nexus [A]. In R. Wodak & B. Forchtner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C]. London: Routledge. 1-14.
- Wodak, R. & C. Ludwig. 1999. Introduction [A]. In R. Wodak & C. Ludwig (eds.). *Challenges in a Changing World: Issue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Wien: Passagen Verlag. 11-19.
- Wodak, R. & M. Meyer.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ition) [C]. London: Sage. 1-33.
- Wodak, R. & M. Meyer. 2016.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3rd edition) [C]. London: Sage. 1-22.
- Wodak, R. & E. Vetter. 1999. Competing professions in times of change: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TV talk-shows [A]. In R. Wodak & C. Ludwig (eds.). *Challenges in a Changing World: Issue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Wien: Passagen Verlag. 209-228.
- Wodak, R. & G. Weiss. 2005. Analyzing European Union discours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A]. In R. Wodak & P. Chilton (eds.). *A New Agenda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Methodology and Interdisciplinary*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21-133.
- Wodak, R., R. de Cillia, M. Reisigl & K. Liebhart (eds.). 2009.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2nd edition) [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纪卫宁, 2013, 维也纳学派的批评话语分析思想论略 [J], 《当代外语研究》(3): 14-17。
- 涂纪亮, 2005,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王凤才, 2011, 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5): 123-129。
- 王寅, 2013, 维特根斯坦“前期、后期、后现代”哲学之我思(上) [J], 《语言哲学研究》(2): 1-13。

收稿日期: 2018-12-03; 修改稿, 2019-04-07

通讯地址: 100872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Recursive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in child language (p. 323)

SHI Jiawei & ZHOU Peng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Iain GIBLIN & Stephen CRAIN (Dept. of Linguistics, Macquarie University, NSW 2109, Australia)

Recursion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of discussion in linguistics. The claim that recursion is a basic property of human language has been under serious debate for the past few years. Some prior research on child language showed that children younger than 6 exhibited difficulties in understanding and producing recursive constructions, suggesting that a full command of recursion was only achieved at a relatively late stag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Previous findings seem to pose a challenge to the claim. The present study adopted an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method, an elicited production task with a truth value judgment componen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4-year-old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have acquired the recursive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4-year-old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sufficient language input, demonstrated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production of the Mandarin recursive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therefore providi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claim that recursion is a basic property of human language.

On the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method of language elements in language evolution research (p. 334)

LI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Language evolution research needs methodology. The basic methodology is mainly based on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every element (chiefly lexicon) of languages. It develops initially from comparison done by manpower, then lexicostatistics (statistical comparative method), probabilistic model (probabilistic comparative method), computer technology (tool) and biological method (borrowing) into the current quantitative method (quantitative similarity method). Modern methodology has already transcend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been applied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y ratio in human languages.

Exploration of postmodern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thoughts in Ruth Wodak's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p. 347)

YANG Min & WANG 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developed by Ruth Wodak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DHA is rooted in deep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thoughts of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Habermas, the deconstructive theory of Foucault and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Philosophers and sociologists such as Bourdieu, Giddens and Bernstein have also inspired the development of DHA. It is expected that via an explor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thoughts of Ruth Wodak, this paper could sort out the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DA and elucidate the mode of combining CDA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A generalized unselective binding approach to in-situ and ex-situ wh-phrases in Chinese (p. 357)

YUAN Y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In mainstream Generative Grammar, Chinese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most typical wh-in-situ language, which has been studied mainly from LF movement or unselective binding (UB), seemingly un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wh-frontings in Chinese much like in English. Pan (2014) initiat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typology of Chinese wh-ex-situ expressions and ascribes them to four types, including extracted and base-generated topics and foci. The pending question now is, how to interpret the wh-in-situ and wh-ex-situ phenomena in a unified way. In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UB theory in generative grammar and the phenomena of partial wh-fronting to landing sites below CP in Russian and Polish (Stepanov & Tsai 2008), similar to Chines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ion of generalized wh-in-situ (G-wh-in-situ) and generalized unselective binding (GUB), and develops it into a split CP GUB framework against the left periphery cartography of CP. Within this framework, Chinese wh-questions embodying Pan's (2014) four types of wh-ex-situ are successfully interpreted.